

互联网时代,让古籍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

——沪上专家学者为数字媒介下古籍保护和传承建言献策

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日前宣布,全面启动在全国范围内修复来自国家图书馆、各地方图书馆、博物馆等机构的105册(件)古籍。这也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于今年6月在国家图书馆启动以来,在推动我国古籍修复、人才培养、古籍活化与数字化工程方面迈出的最新进程。

此次入选的书籍涵盖《永乐大典》善本1册、舆图绘本24幅、样式雷图档30幅、金石拓本13件,以及中医药、少数民族文字等类型古籍37册(件),其中《医门普度》是一部涉及流行性传染病的综合性著作,编录了吴又可《温疫论》二卷、孔毓礼《痢疾论》四卷等医学著作,对现代医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这些古籍来自国家图书馆、各地方图书馆、博物馆等机构,修复工作均由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负责,将在1-2年内完成。

今年7月28日,字节跳动公益还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、国家图书馆发起“寻找古籍守护者”活动,招募创作者通过抖音、西瓜视频、今日头条等平台,创作相关内容、推动古籍活化、助力传统文化传承。

目前,已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九位专家学者、文化名人和抖音达人加入该活动,同时因其在各自领域的专业度和影响力,更成为“古籍推官”。这其中就包括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强,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,漫画家蔡志忠,学者周国平等。

日前本报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主办的“互联网时代,如何推动古籍保护与传播”研讨会上,沪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,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要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,要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。互联网时代,人们阅读的便利性、丰富性已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;但也正因如此,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时间赛跑。加强中华文化古籍保护和传承,推动修复、活化和传播能力建设,对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意义。

(汪荔诚)

陈超(上海图书馆馆长): 互联网时代,如何传承古籍

值得欣喜的是,字节跳动这样的互联网的企业,来主动关心、关注这个领域。作为古籍保护的机构,图书馆、博物馆、高校,要用好这样的市场力度。

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,非常愿意和各界一起展望未来,共同演绎,不断地推进上海地区的古籍保护和传播的工作。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,把中华典籍,中华文化传下去,发扬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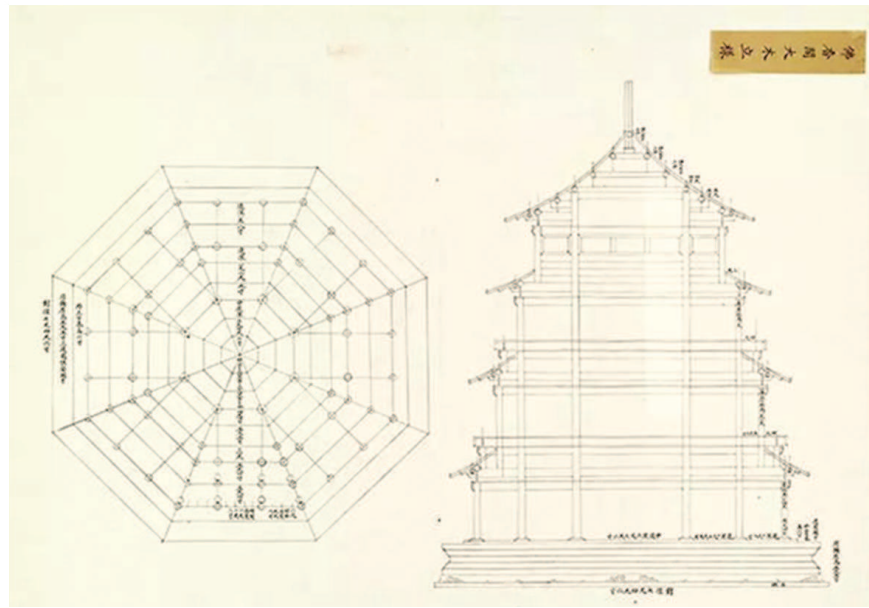
杨光桦(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): 互联网环境下的古籍保护与传播漫谈

身处互联网时代,如何推动古籍保护和传播,让古籍更好地活化传承?不仅要让古籍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还需要解决古籍保护的经费、法规和人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。

目前古籍保护有一个困境,有一句话叫作“哈佛或者东京很近,北京很远”,简而言之,即日本、美国等古籍资料网上发布多,容易获得;中国本土的古籍网上资源发布少,获取不易。目前,中国国家图书馆已将馆藏十九种古籍相关数据库资源全部开放,可以网上自由浏览,有望改变网络古籍数字资源的中外格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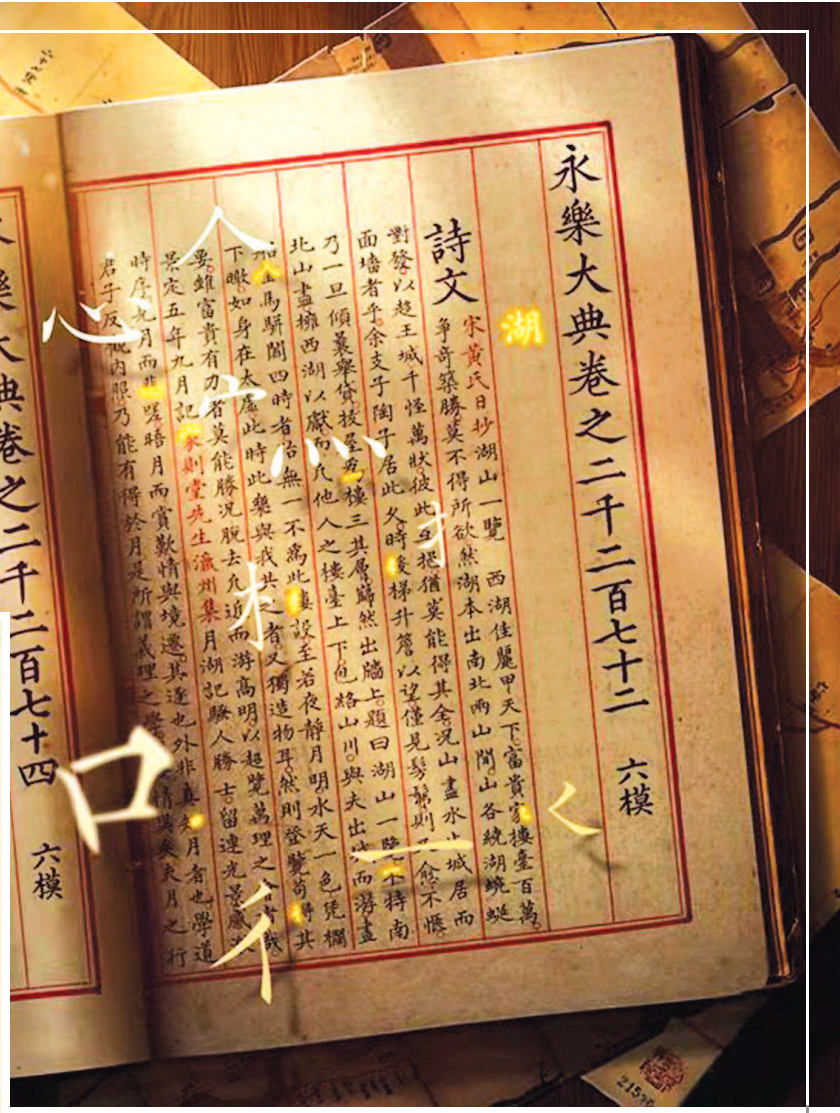
建设上海古籍保护与传播数字联盟,很有必要。毕竟上海地区是古籍资源收藏重镇,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就有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、复旦大学等七家,上海档案馆、方志办、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、上海图书公司(博古斋)等纸质文物收藏也很丰富,如果成立上海古籍保护与传播数字联盟,将各自特色馆藏数字化,提供网络服务,将有力促进上海乃至中国古籍数字资源的释放与活化。

同时,当下民间古籍书源日渐枯竭,如果能建设公藏机构古籍复本互联网交易平台,有利于古籍资源流通和活起来。目前孔夫子旧书网是民间最重要的网络交易共享平台,建议国家出台特殊政策,将国内公藏机构三个以上的复本古籍释放出来,建一个互联网共享交易平台。不仅节约大多数收藏机构的物理空间,更可促进古籍流通活化利用以及避免数字



▲《永乐大典》“湖”字册

▲頤和園佛香閣圖檔



▲《永乐大典》“湖”字册
▲頤和園佛香閣圖檔

张涛甫(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): 古籍牵手数字媒介,传承历史与文明

古籍的读者和研究者毕竟是小众的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对古籍的认知和理解是有限的,古籍文盲、半文盲占据了中国的大比例人口。古籍之于中国的价值、之于中华文明的命运,不仅取决于小众的古籍专家,还取决于占据大比例人口的古籍文盲、半文盲,毕竟这大多构成了国民的基本盘。古籍不仅仅是古籍专家、文物专家的专场,而是所有国人乃至人类的共同财富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,因此多多少少与古籍有关。古籍是历史文明的物质性载体,即便那些没有机会零距离接近古籍的人,也并非与古籍无关,他们或远或近,忽明忽暗与幽远的历史关联。

历史往往以两种方式存在:一是有形的方式存在,古籍是有形历史的显性载体;二是无形的方式存在,表现为隐性的知识和默会知识。在我看来,二者是关联的,失去了前者,后者就成了无源之水。古籍作为物质性存在,往往是不可再生、脆弱的,一旦受损,多是不可逆的,即便可修复,也是缺憾的。因此说,古籍保护不仅是古籍专家和文物工作者的事情,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责任。

互联网之于古籍,似乎一个在火星,一个在水星,一个代表遥远的过去,一个代表热气腾腾的现在以及无限可能的未来。前者是古典媒介,后者是新媒介,二者代表两种媒介形态,两种文明形态。古籍代表古典文明,承载中华传统文明和历史,互联网代表数字文明,承载当下和未来。对于活在当下、面向未来的我们而言,互联网成为连接万物、网罗世界的天罗地网,它无孔不入地介入芸芸众生的生活日常,成为记录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的即时媒介,成为书写个人、社会和国家历史的主体载体。

在互联网所编织的信息海洋中,古籍容易在公众的视野中沉没,在满屏刷屏的信息中,古籍消隐在公众注意力之外。长此以往,古籍与人们的关注愈来愈远,以至于被人们所遗忘。不能奢望公众把兴趣聚集到古籍上来,相对于互联网而言,古籍的门槛是高的,远的,也是冷的,远不及互联网这么近,这么贴心贴肺,但古籍需要保护,需要公众的集体呵护,也需要政府机构和公共力量的积极、有效的照拂和应援。

今天,互联网头部平台字节跳动出于公益动机,施以援手,致力于古籍保护、数字化、活化工作,体现了互联网头部平台的前瞻视野和社会责任感。数字媒介牵手古典媒介,将数字文明与古典文明紧紧连接在一起,演绎了中国媒介史的一段佳话。

高克勤(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):
做好古籍保护工作,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保护古籍,首先是从物质形态方面

顾宏义(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): 化身万千——数字化时代的古籍保护与传承

使古籍能“以人传人”,通观古今,大致有三大途径。其一,通过精心的修复、保护,延长传世古籍之寿命。其二,通过复制、出版等手段,使古籍“化身万千”,传布人间。其三,对古籍加以注解、诠释,以便于世人尤其是初学者得以阅读、领悟古籍所记载的古人思想、知识的精粹,从而乐于投身于对古籍的保护、传承之事业。

因国家支持,社会关注,今日古籍的出版,尤其是影印出版方面,已非以前所能比拟,即传世的重要著述大多已得到出版,使得古籍尤其是善本的保护、收藏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大为改观,大大便利了世人的阅读、利用。同时,文献数字化建设的日新月异,也进一步对人们地阅读、利用古籍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便利。然而上述三个方面,仍存在不少可以改进、提高之处——

面对数量浩瀚的古籍急需修复,而修复人员需要相应的文史知识、美学知识与古籍保护修复知识、技能等,迄今修复保护人员的整体数量及其素质等,皆与所要承担的任务颇有距离。因此,是否利用上海地区的相关力量,整合协调,设立一个古籍保护、修护机构及其教育机构,在开展古籍修复、保护工作的同时,加紧相应人才的培育,以满足当下与今后古籍修复保护工作需要。

同时,就出版印刷质量、选题优劣等而言,颇给人以鱼龙混杂之感,且存在相当数量的重复出版问题。今年古籍出版资助申请,就发生了一种篇幅相当可观的古籍整理,两家出版社撞车之事,两家整理的思路、方式等大体相同。此显然是缺少信息沟通所致。因此,为避免资源浪费,可否由政府组织,或委托大学或出版机构,构建一平台或协调机构,对已出版之古籍整理著作与影印著作,以及将要整理出版、影印的古籍情况,作一汇总,利于对基本古籍、一般古籍等进行分类管理,也便于整理者、出版社了解相应的整理、出版信息,更利于读者了解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古籍及其整理著作。

古籍数字化以及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共享服务问题也不容忽视。国家应出台相应的规定,得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数字化古籍资料,应尽可能的都予以上网,让全民共享。但限于条件,资源上网共享,可分批进行,首先选择提高国民素养的基本古籍,并选择其中版本情况良好的传世本,以及整理与注释优良者,先上网;然后再选择一般古籍,而后选择较为冷僻的古籍等等。

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当下,应充分利用各种国家的、民间的有利资源,构建古籍保护、利用和数字化信息资源平台,通过加强信息传递、管理,通过古籍整理、出版,通过将数字化古籍上网共享等手段,以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、研究者的需要,从而让广大读者、研究者充分享用数字化资源共享所带来的现代化便利。

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,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,让文物真正活起来,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,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。

互联网时代如何推动古籍保护与传播?部分古籍的回归只能以数字化的形式来实现。今年刚刚结束的《大唐气象》碑帖展出了唐碑宋拓,吸引了大量的书法爱好者。如何做好展览?如何让线上展和数字展更精彩?在这个领域,需要字节跳动在内的互联网技术、平台一起合作。

处在互联网时代,要积极探寻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、新方式。去年,图书馆员做了一个小尝试,在网上开一个平台,让古籍研究的专家、馆员在互联网上说善本、讲碑帖、说稿本、讲家谱。

在编书方面,除了和出版界合作,还应该和互联网界合作,探索新的编书模式和方式。

按照国家的要求,这十余年来,上海图书馆对开展的珍贵古籍的名录、重点保护古籍单位的评审等一些职能都在实施。目前已经有六批,分藏于本市各收藏单位的1473种古籍,入选了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。在此基础上,930种古籍被推荐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。

上海的9家古保单位被颁发了上海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牌。十多年来,上海图书馆一直督促本市古籍普查工作,这也是一项社会普及工作。上海图书馆还组织多次古籍修复技能的竞赛、培训、研修,培养古籍修复的人才。

古籍修复工作,其实是广义的编书的内容,是整理、修复、应有之义。需要高科技和新技术的支持,例如化学领域的支持等。上图也在建实验室,赋予古籍保护工作更多新的空间。

在当下,印书因为互联网、数字技术的帮助而赋能。数字化数据库建设,如何加速?如何让孤本不“孤”?互联网时代下,怎么样去复制?衍生了诸多技术和学术问题,值得研究和探讨。



▲传承人杜伟生在进行修复项目古籍修复代表工作